

# 传媒与社区发展的跨文化视角探索

## ——基于传播基础结构的中澳韩国社区比较研究

黄 廓<sup>1</sup>, 姜 飞<sup>2</sup>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英语中心, 北京 100040;

2.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通过对社区、移民、媒体这三个正影响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并将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的研究, 以中澳两国的韩国人社区为重点研究对象, 基于跨文化研究和传播基础结构理论, 探讨媒体/媒介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研究者关注到信息传播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缩写为 ICTs) 和新媒体对社区和社会的重构, 以及现代社会转型、人员国际流动对移民接受国的影响, 指出进行“社区跨文化传播” (Communit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缩写为 CIC) 研究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社区媒体; 社区传播; 传播基础结构; 澳大利亚研究; 社区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7)06-0036-12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7.06.005

### 一、社区概念与研究的变迁

因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和学术研究范式的发展, 学界对于社区的定义一直处于发展之中, 较为通用的是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前提进行概念界定。1955年美国学者 G. A. 希莱里对已有的 94 个关于社区定义的表述作了比较研究, 发现其中 69 个有关定义的表述都包括地域、共同的纽带以及社会交往三方面的含义, 并认为这三者是构成社区必不可少的共同要素。<sup>[1]</sup>

在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 “社区”与“社会”有着不同的意涵、建构过程和内在结构。滕尼斯在 1887 年较为清晰地指明建立社区 (Gemeinschaft) 的基础是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等, 由意向、习惯、回忆等“本质意志”所决定; 在传统农业社会社区研究中, 成员对本社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社会”是与社区相反的人群组合, 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而建立起来, 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而组成的机械的合成

体; 因此, “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sup>[2]</sup>

城市“社区”似乎处于传统农业社区和现代社会的“交集”, 是一种主体、时间和空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 并且会持续很长时间。麦其维认为“社区是任何共同生活的地区, 其居民能形成某种共同的特质, 如态度、传统、语调等”,<sup>[3]</sup> (PP. 22—23) 芝加哥学派的帕克<sup>[4]</sup> (P1)、芮德菲尔德<sup>[5]</sup> 等随后提出了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人与城市的二分法;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帕森斯则进一步发展出集体取向与个人取向、特殊性与普遍性、扩散性与专一性、情感性与情感无涉性、先赋性与自致性五对“模式变量”, 用以表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sup>[6]</sup> (P26)

从知识生产视角看, 芝加哥学派对社区研究主要有三方面贡献, 一是将生态学原理引入社区研究; 二是用文化共生系统视角来研究社区, 三是强调了媒体在社区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sup>[7]</sup> (P636) 芝加哥学派发现了社区成员存在种族、民族、社会地位等差异, 故此成员本能趋向发展和维护自己所

**[收稿日期]** 2017-08-25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合作研究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 黄廓 (1972—),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哲学博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首席研究员, 资深翻译, 从事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受众研究

属的语言、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典型代表是基于民族文化凝聚力而在异国形成唐人街、黑人区，或基于社会等级“画地而居”形成富人区、贫民窟等。芝加哥学派多基于社区的空间布局，研究社区的“分隔性”以及与其他社区生态的“共生性”；<sup>[8]</sup>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则更注重社会运行以及社会发展的平衡、协调的机制，并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研究模式；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城市管理主义学派等则从财富集中、社会冲突、骚乱无序等现象入手，通过政治经济学视角和权力分析对社会变迁进行合理的解释。<sup>[9]</sup> (PP. 3-17)

中国关于社区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主持了多项基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孙本文、朱亦松、简贯三等提供了本土化的综合研究视野；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社区学派代表人物则进行了大量的社区实地研究，并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进行理论探索。中国的社区研究曾因受到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的影响，有过一段时间的停滞；到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恢复后，费孝通等再次推动了城乡社区研究以及社区概念的普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形象描述，用石投水中的圈圈波纹，来形构了乡土中国的以个人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近邻、社区和国家的结构。<sup>[10]</sup> (P25)

1979年后中国关于社区的研究重新回到介绍西方研究的起点，本文研究者在CNKI数据库以“社区”为主题词进行查询，1979年仅有两篇以翻译、资料性介绍为主的成果。<sup>[11-12]</sup>1984年起，关于社区的概念、属性的研究性文章逐渐出现。<sup>[13-16]</sup>1990年起，关于社区的文章数量开始每年超过百篇；2001年起每年过千篇；2006年起每年过万篇。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社区的研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多数研究强调“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两个基本属性，有时会侧重于其中一点，部分注意到不同社区间的文化、生活方式具有可区别性，但深入研究较少；二是研究视角强调人群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维系力和内部归属感居多，采用较为全面的视角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而进行的研究较少，因此仅从地理要素（区域）、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人口要素以及社会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概念、设计研究框架<sup>[17]</sup>存在不足。

## 二、为什么需要重视社区尤其是社区传播研究

(一) 技术视角：新媒体正在重构社区和社会信息传播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缩写为 ICTs) 新兴媒介推动着新兴社区元素和模式的出现，正在结构化地改变着社会最基础的元素细胞，进而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2017年2月17日，脸书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以《建立全球化社区》为题目，通过6千字长文，阐释了全球最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未来使命：帮助人们相互理解，拯救日渐分化的世界。这一充满现实关切和未来视野目标的实现路径，是建立“一个互动的、安全的、消息灵通的、包容的全球化社区”。<sup>[18]</sup>扎克伯格重提社区为中心词，其商业发展动机毋庸置疑；但同时他从媒体视角拓展了社区的概念、强调了社区的互动与连接功能、明确了媒体在社区构建中的价值，而且指出了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并存的当前环境下，回归社区极为重要。更重要的是，站在拥有超过20亿的月活跃用户的数字王国之巅，扎克伯格认为当前甚至未来，强化社区功能、促进社区发展是应对贫困、移民、文化冲突等全球性问题的有效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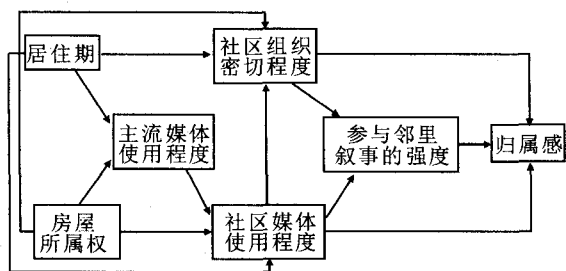
(二) 发展视角：社区发展、构建与社区媒体密切相关

社区发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 是指社区居民在政府机构的指导和支持下，依靠本社区的力量，改善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解决社区共同问题，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sup>[19]</sup> (P10) 美国社会学家 F. 法林顿于1915年首先提出了社区发展这一概念。<sup>[20]</sup>1939年，美国社会学家 I. T. 桑德斯和波尔斯在其合著的《农村社区组织》一书中，对社区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sup>[21]</sup>1951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通过了390D号议案，计划建立社区福利中心，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久又将“社区福利中心计划”改为“社区发展计划”。1954年，联合国改组社区组织与发展小组，建立联合国社会事务局社区发展组，并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社区发展运动，使得社区发展逐渐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的重视。

(三) 空间视角：社区媒体构成的传播基础结构决定社区发展

研究表明，社区媒体和社区居民所接触的媒体

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教育和服务、构建社区公共领域、实现利益诉求、推动社区发展等功能。社区媒体具有“内生性”特点，因此在构建居民“故事讲述”结构和社区公共空间方面具有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sup>[22]</sup>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带领的课题组，从1998年起在以人口和文化的多样化而著称的洛杉矶市开展了《传媒类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Metamorphosis: Transforming The Ties That Bind)的大型研究。<sup>[23]</sup>该研究选取了“最具多样性”的城市——洛杉矶为样本，选择该市的七个社区为研究点，通过多种语言接触社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并采用电话访问调查、焦点小组、社区管理者和当地传媒业者访谈等研究方法，收集信息并据此分析传播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



图片来源: Ball-Rokeach, S. J. & The Metamorphosis Project Research Team, (2000). The challenge of belonging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ase of Los Angeles. Metamorphosis Project White Pap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ty Progra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P14. 作者翻译

图1 理想的社区叙事体系

研究显示，社区传播基础结构对居民的归属感产生的影响最大，超过了财富或特定的文化背景。传播基础结构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是置于传播行动背景下的趣闻轶事讲述体系，它包括人、传媒、社区组织创造与传播的日常谈话与趣闻轶事 (即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网络)，以及居住地所拥有的促进邻里传播的资源 (即传播行动的环境，如公园、安全的街道、图书馆、学校等)。<sup>[24]</sup>体系中的“叙事者”包括社区居民、(该区域) 传媒和社区组织。社区传播环境主要指公共空间 (人们在此聚集并分享故事)，也包括该区域的安全程度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如政治、经济设施。传播基础结构之所以具有隐形特征，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它习以为常，只在发生异常事件时才会注意到传播基础结构的存在。<sup>[25]</sup> (P7)<sup>①</sup>

在传播基础结构理论框架下，特定的社区传播环境是进行趣闻轶事讲述 (叙事) 的前提。它包括

鼓励或阻碍传播的各种因素，如社区资源、媒介丰富性、事件趣味性等；以及促进或阻碍传播的社会文化特征等，如语言障碍、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在本质上，传播环境随着开放和封闭的程度而变化：一个开放的环境能鼓励人们与他人沟通，而一个闭塞的环境会阻碍人们互相交往。

(四) 主体视角：“单位人”、“社区人”、“国际人”的主体转型

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sup>[4]</sup> (P1) 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多元文化、多层结构的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和乡镇的重要行政和社会单位。自1998年开启的商业化房地产制度，使得人们被从各种“家属院”中剥离出来，<sup>[26]</sup> (P61) 城市中原本显著的“单位”社会职能被剥离，社区成为社会职能的承担者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城市居民在从“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过程中，建立起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同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对生活的渗透，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对社区甚至周边环境的依赖。更重要的是，传统的社区概念延伸到网络，形成脱离传统地理要素限制的网络社区如中国的天涯社区注册用户已达1.3亿；<sup>②</sup>同时，从传播基础架构的视角看，传统社区中的传播方式产生了从传统媒体逐步向新媒体过渡的现象。因此社区研究需要同时关注到上述变化，并有效结合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甚至更应该从传播学视角关注社区问题。<sup>[27]</sup>

这种社区与媒体双重转型的中国国内现状同时受到了国际新趋势的影响。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人员流动多元化的出现，以及中国综合实力增强成为新兴移民目标国，中国与世界各国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非传统问题的挑战，如冲突频发、移动加剧、个体赋权等。移民共同体的存在曾被视为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sup>[28]</sup> (PP. 5-8) 移民的适应行为的确会对所在国产生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影响，<sup>[29]</sup> 因此在社会学、传播学的基础上，加入跨文化研究才能够更为全面有效地研究社区问题。

(五) 知识生产视角：我国对社区传播研究严重不足

杜威 (Dewey) 在1916年就认识到“社会不仅通过传输和传播而存在，而且社会也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传输和传播之中”。<sup>[30]</sup> (P13)<sup>③</sup> 1922年帕克注意到社区与媒体、移民之间具有密切相关性并

开展研究。同社区媒体的重要性和社区媒体发展的现状相比,我国对社区媒体的研究严重不足。研究者查询 CNKI 数据库发现,我国关于社区与媒体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03 年,仅有 4 篇。<sup>[31-34]</sup>而以“社区媒体”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含硕士论文)迄今只有 117 篇,其中部分是与社区媒体相关的广告、新闻。社区媒体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教育和服务、构建社区公共领域、实现利益诉求、推动社区发展等功能。

在我国对社区与媒体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面上项目“北京城市社区媒体研究”较有代表性。该项目从居民和居委会两个层面,对六个典型社区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居民普遍对社区媒体概念陌生,缺乏热情和关注;但社区居民的群体结构及角色认同,居民之间缺乏日常交流的现状,以及获取新闻信息主渠道的变化等问题,都在客观上要求社区媒体的存在和发展。通过对国外社区媒体发展的经验借鉴和中国社区媒体的初步实践,我国社区媒体发展出现两种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大众媒体的社区化转型,二是草根媒体的社区化成长。<sup>[35]</sup>社区媒体的优势是服务性强,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和健康问题。多数居民仍期待街道社区成为媒体的主办方,但目前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能力结构难以适应媒体建设的需要。<sup>[36]</sup>

### 三、本文的研究逻辑

#### (一) 社区是社会文化建设的基层组织细胞

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证实,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社情民意、社会基层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地带。社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文化,在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发展,是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sup>[37]</sup>(PP. 84-86) 具体来说,社区文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物质方面,即该社区内的文化活动、场所、设施;精神方面,即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培养起来的社区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新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审美情趣、人生乐趣和生活方式等;制度方面,即为保障社区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建立的一系列规章、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所构成的规范结构。<sup>[38]</sup>

#### (二) “社区”概念与形式存在东西方差别

梅因在 1871 年首次使用了社区 (community) 一词,<sup>[39]</sup>该词在拉丁语词源中意指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西方的社区是“具有共同价值取向

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sup>[2]</sup>这个没有强调地域因素的社区概念,明确突出了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对社区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重要性。在中国,社区一般指“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的以单位制为主、以基层地区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国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居体系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和整合,达到了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的目的”。<sup>[40]</sup>

#### (三) 东西方社区形式与对社区的认知逐步接近

随着新媒体推动“虚拟社区”的涌现及其运作模式,以及 1990 年代末以来中国商业化居住模式的转型,在有关“社区”的理解方面东西方开始逐步靠近。网络上的虚拟社区一般是根据共同兴趣和活动主题聚集起来的一群人;而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的商业化住宅小区逐步更新了中国传统的单位家属院式的居住模式,“社区”由原来的单位、机构、街道为核心的构成模式,转换为商业化的住宅小区,而这样的小区的人员,则在某种程度上一般是基于对新兴商业小区的管理理念、居住环境、价格(收入水平)等基本认同基础上的人员共同体,这就和西方社区理念逐步靠近。

#### (四) 传媒影响社会、社区发展成为东西方共识

不同的媒体形式和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尤其是对于社区和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东西方学界和社会共识。20 世纪早期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将传播 (communication) 作为研究的核心命题,并将其看作 20 世纪社会构成的首要因素。<sup>[30]</sup>(P15) 从 70 年代以后传播学者愈加认识到:“大众传播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它可以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影响它对英雄与恶棍的选择,影响它的公共政策与技术。特别是媒介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能对社会变革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sup>[41]</sup>(P117) 有学者指出,“媒介除了发挥其一般性的传播信息和知识、提供娱乐等功能外,还发挥着另外独特的功能,即宣传、引导、创造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改变、制造着我们的精神性空气和水,从而最终铸造、改变我们的体质和思想”。<sup>[42]</sup>

#### (五) 移民和族裔问题凸显社区问题的跨文化研究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人口国际、国内流动便利

性、频繁性，各国移民问题、族裔冲突问题频发，并且影响层面大、效果突出。美国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文化政策经历了“大熔炉”、“沙拉碗”到“文化织锦”的递进修订，体现了走向宽容和开放的路径选择。<sup>[43]</sup>澳大利亚政府逐步推行种族和解运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百多年来白人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但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居民，正在逐渐被归还自己应有的尊重。<sup>[44]</sup>而对外来人口的有效安置，使得澳大利亚成为解决当前移民问题的重要参考国。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居加剧，以及对外来人口吸引力的增加，使得中国的社区发展必须关注跨文化因素。

#### 四、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用综合的视角关注社区、移民、媒体这三个正影响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并将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将社区作为“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研究思路是社区“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与人类属性的共同产物”，<sup>[2]</sup>研究方法则结合观察法、访谈法并进行共时性比较，分析传媒与社区发展的关系。本研究以“成员在生活、心理或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和共同认识的个体和群体的集合”为社区的工作定义，以“社区组织者为维系社区关系、开展社区活动等以及社区成员彼此间沟通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及其载体”为社区传媒的工作定义，以“离开本人之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学习、工作或生活等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sup>[45]</sup>为移民的工作定义，以基础媒介体系、基础传播结构建设为理论框架，通过定性研究，分析中澳两国传媒与社区发展的关系。

本研究选取中国和澳大利亚作为对比研究国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受到经费、时间等条件限制，研究人员采用了共时性研究方法。澳大利亚是传统移民国家，中国是新兴移民国家，二者进行对比，在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经验和路径参考价值，可以丰富因受到研究时间和周期限制而可能相对简单的研究结果。二是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韩国移民数量显著性都较高，韩国族裔社区特色明显，具有研究价值和意义。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公布的2016年最新的人口普查（CENSUS）结果，澳大利亚的海外出生人口比例（26%）超过加拿大、美国等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在亚洲出生的人数量首次超过了欧洲，亚裔将成为

澳大利亚最大的族群；<sup>④</sup>悉尼韩国人中心数据显示，仅新南威尔士州就有近15万韩国人加入该会，悉尼是最集中地区。<sup>⑤</sup>在华韩人会数据显示，在中国长期居住的韩国人有30万到40万之多，北京一地有10多万。<sup>[46]</sup>

本研究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调查方法主要采用实地走访观察法结合深度访谈法。研究人员在2013年9月5日走访了韩国人在北京最集中居住地望京，并访问了望京街道办事处；2013年12月13—24日实地走访了澳大利亚悉尼韩国人相对集中居住的伊士活（Eastwood）和好市围（Hurstville），以及肯思（Campie）悉尼韩国人中心。研究人员的实地观察内容包括这些社区里的户外媒体、公共设施。深度访谈对象包括社区组织者、工作者，向其了解社区历史、社区特点、社区成员、社区基础设施、社区媒体、社区活动、政策支持等情况，及其对社区发展的做法；同样问题在调整角度后向社区成员求问，以形成全面、客观、真实的意见。访谈内容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录音，内容整理后经课题组所有成员确认。

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中、澳两国，韩国人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有何同异？社区发展目标有何同异？媒体对社区发展产生的影响有何同异？

#### 五、研究发现

（一）中澳两国的韩国人社区在两国国情允许空间和韩国民族文化认同需求间寻求平衡，产生了适应所在地的社区形成与发展模式

##### 1. “共同文化”与“共同地域”作为核心形成社区基础

本次调查发现，澳大利亚悉尼韩国人社区明显以“共同文化”为形成根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高层建筑少，独栋和连栋房屋较多，私家车普及，人群居住分散。因此即使韩国人相对集中的伊士活和好市围，也没有韩国人非常集中居住的现象。根据“悉尼韩国人中心”（Centre for the Korean Society of Sydney, Australia）经理 Sherman Kim 介绍，整个新南威尔士州的韩国人是基于文化认同而成为中心成员的，该中心有普通成员13万人，还有每年缴纳20—30元澳币的付费成员1万人。<sup>⑥</sup>

北京的望京韩国人社区则具有鲜明的“共同地域”特征，韩国人居住相对集中。望京街道办事处的一位主任说：“我们都是从组织行政的角度来理解社区的，在北京都是从市到区，然后再到街道，街道下面就是社区，社区应该是最基本的组织单

位,一般都几个小区。”据该主任介绍,望京辖区内共有6万余外籍人士居住,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韩国人占85%,约有5万人。<sup>⑥</sup>调查显示,91%的韩国人集中居住在望京地区20个小区中的3个小区,<sup>⑦</sup>呈圈层分布结构。<sup>[47]</sup>这与北京居住人口高度密集,商业中心区相对集中、私家车购买和行驶受到政策限制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时,望京韩国人社区同样具有“共同文化”特征,韩国人基于民族认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群体,与同在望京居住的中国人、朝鲜人“共存而不交流”。<sup>[48]</sup>

北京也有类似悉尼韩国人中心的组织,名为“在华韩人会”,设有六个地区分会,覆盖57个城市。会长林英虎就住在望京,他称韩人会的功能是“帮助韩国人更好地在中国工作、生活和学习,并且保持情感上的交流和工作生活上的帮助。”<sup>[46]</sup>该协会组织过联谊活动、学汉语和中国文化等活动,但更多从事的是相对高级别的公益活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搭建两国政府间联系等,因此不具有望京韩国居民认同的社区凝聚力。

## 2. 定居与暂居的居留性质差别显著

澳大利亚如今已成为移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其移民吸引力大、政策成熟、路径通畅,所以对悉尼韩国人社区的调查显示,长期居住的移民(满足入籍、永居、居住五年及以上、有永居或入籍计划任一条件者)占绝大多数。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原因和途径非常多元,工作迁移、家庭团聚迁移、避难迁移、学习迁移等都有。家住伊士活的受访者 Hannah Park 称,她读小学的时候从韩国来到澳大利亚,40多年了,如今在悉尼成家、工作,从没有再回韩国定居的想法。她的直系亲属也多移民到悉尼,所以对亲情的需求在澳大利亚已经得到满足。她在家里和韩裔丈夫、孩子说韩语为主;但孩子在这里出生,更乐意用英语和她们交流。她和丈夫有意鼓励孩子说韩语、接受韩国文化习俗。她们全家都有很多韩国人之外的朋友,生活中很少感到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困难。<sup>⑧</sup>

中国的移民政策相对保守,一是不承认双重国籍,二是直到2004年才开始实施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绿卡”制度,但被称为全球最难获得的绿卡。201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被视为“首次全面放开的移民新政”,其效果目前尚未达到可查验的阶段。在2004年至2013年的10年间,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发放的绿卡总数仅7356张,过半数发放给回国探亲的华人。

因此在2013年本研究对望京韩国人社区调查显示,该社区的韩国人流动性非常高。有研究对韩国人居住最密集的望京西园四区的韩国住户的签证类别和承租期限进行统计显示,持短期签证的人数高达60%,租期在一年以内的达97%,租期不足一个月的占到近三成。<sup>[47]</sup>对望京地区的调查发现,韩国人来华的原因和途径相对集中。韩国人成规模地到中国始于1992年两国建交后,多为政府、公司或媒体机构的派出人员。1997年望京西园四区竣工后有200多户韩国侨民从花家地搬迁到此,成为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雏形。后来,望京地区吸引了自我创业人员、留学人员、陪同孩子学习和随行家属等韩国人群。

望京韩国人的暂居性(Sojourning)特点使得该社区成员具有“志在未来”的特点,他们的主要诉求<sup>⑨</sup>得以实现后可能会回归故里或另寻他处,因此具有在经济上采取特殊行动、集中从事某些特定职业的现象,甚至带来“在移民共同体内部产生认同感”的非经济性结果。<sup>[49]</sup>(PP. 583—594)在望京的韩国人目前主要有四类:一是经营韩国用品商店、餐厅、幼儿园等的自主创业者,目前已经成为望京地区数量最大的韩国人工作种类;二是在周边高校和国际学校上学的留学生,中医药大学、中央美院等对韩国学生较有吸引力;三是驻华使馆外交官、其他机构派驻人员和韩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该群体在2008年前曾数量最大,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韩资企业的撤离而数量锐减;四是随行家属,其人数之多甚至超过留学人员和派驻人员。有受访者称“韩国男人来中国,会带上老婆、几个孩子、父母,再雇个鲜族保姆伺候这一大家子”。<sup>[47]</sup>

## 3. 文化隔离与文化冲突产生环境与程度差异明显

因为分散的居住方式,尊重隐私的西方文化传统,相对长期、稳定的居住环境,在悉尼的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文化隔离程度、冲突程度都较低。对悉尼韩国人社区经理 Kim 采访时,他介绍说无论在社区内部还是在社区成员居住地,都很少发生剧烈文化冲突的现象。悉尼韩国人社区与华人、越南人、蒙古人、中东等社区都有联系。“社区里也有朝鲜成员,但是大家从不揭露他们的身份,只有三位全职员工知道,大家和睦相处。”在交谈中他多次强调“和谐相处”(make harmony),但他承认冲突也确实存在。“一方面文化差异产生交流障碍,亚洲文化比较相近,但是和中东地区的差异就会比较大。以脾气为例,中东人易怒,一下就爆发;亚

洲人可能会不断压抑，一直到底线，不能再忍，则会集中爆发。语言也是障碍之一，40—50岁韩国人英语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更老的一代可能有问题。”<sup>[50]</sup>

如果韩国人在澳大利亚与其他族裔产生冲突，Sherman Kim说他们首先会向韩国朋友寻求帮助；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则会找韩国人中心办公室。但主要是“常识”（common sense）在起作用：“作为移民，谁也别找麻烦，大家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和谐相处。”<sup>[51]</sup>

在望京的韩国人居住相对集中，韩国移民在望京构建了一个相对自我完备的“韩国生态”，从商业、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到社会团体，韩国人在望京可以“不费劲”地生活，“走在望京的街道上，就像走在自己的家乡一样”。望京教会每周日会有韩语课程，以传承语言。然而，望京没有成为极端封闭的韩国移民飞地，<sup>[50]</sup>韩国人数量毕竟不足望京地区整体居民数量的1/6。但从文化和交流程度看，不同主体感知到的隔离度差别很大。当韩国人被问到与当地汉族关系时，有22.2%的受访者认为“互相没有交往”；受访的汉族中则有71.1%认为与韩国人“没有交往”。<sup>[51]</sup>

暂住性和流动性的韩国移民主体特点和与中国人、其他移民聚居的客观环境，<sup>⑨</sup>使得望京韩国人与社区其他成员发生冲突的机会较多。“夜生活太多、醉酒喧哗、摩托车马达声音过大、不拘小节、小气、看不起中国人”等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成为其他社区成员眼中“韩国人问题”的根源，也是冲突和矛盾频发的促因。

（二）中澳两国的韩国人社区发展目标存在共性

1. 经费来源对社区发展职能影响不大，但经费充足是社区发展的基础

悉尼韩国人中心位于悉尼肯思区一个两层楼的建筑中，经费主要来自捐助，当任会长每年捐助20万澳币。中心有三名全职员工，24名委员，每周聚会讨论社区发展。北京望京街道办事处则是政府拨款机构，设有23个科室，社区办作为其中的一个科室，“负责做好社区居委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负责指导社区居委会搞好社区建设，制定和实施社区建设、发展规划；负责指导社区居委会开展自治工作；负责社区居委会固定资产监管工作；负责社区资源的调查、整合、利用和管理。”<sup>⑩</sup>调研显示，尽管两个社区的构成、组织和管理差异较大，但都积极履

行促进社区发展的职能。

悉尼韩国人中心经理Kim表示在经费问题上他常常感到有压力，这也是维系社区、影响社区发展的最大障碍。社区要组织活动需要经费，但是社区不能经营商业，否则会“抢生意”，伤害社区成员的利益。他们目前能做的是将礼堂出租给其他社区，例如蒙古、中东等社区都来租场地。韩国政府偶尔也会有经费投入支持社区发展，但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非常少。Kim自言“不善于”向澳大利亚申请经费，他说“华社区就很擅长此点，我需要向他们学习”。

望京街道办事处的曾主任主要负责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被问到社区发展有何困难和挑战时，他列举了资源整合、文化活动、文化队伍、国际化、语言沟通五个问题。经费问题不在阻挠望京社区发展的因素之列，因为有政府预算和拨款支持。

## 2. 中澳两国的韩国人社区发展目标大同小异

调研发现中澳两个韩国人社区都在自己的跨文化经历中意识到自己的异质性，并探索出“与即有条件协商的社会适应策略，从而扩大支撑其日常生活及事业发展的空间”。<sup>[50]</sup>两个社区发展目标上较为一致。根据联合国制订的社区发展指标体系，社区发展的目的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提倡互助合作精神，鼓励社区居民自力更生解决社区的问题；二是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在社区发展过程中促进居民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三是加强社区整合，促进社区变迁，加速社会进步。

整体看来，两国的社区在建设过程中对社区发展目标均较为明晰。直接目标包括：了解成员的共同需要；运用并提供各种指导、援助；开发和利用社区的资源；改善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增强社区凝聚力等。从终极目标来看，中、澳两国社区对促进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层面的贡献更为认同。在社会发展层面，中澳两个社区都致力于建立良好的社区内部人际关系和合理的社区结构；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倡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伦理、道德，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曾主任认为社区的建设卓有实效，并举例说2012年北京7·21大雨时，居民在望京网自发组织了双闪车队去机场迎接被困群众，“这个事情在整个北京都受到了很好的评价”。社区经常搞一些主题活动，也会为居委会和居民自发组织开展的活动提供一些便利和支持。Kim说社区充满了活力，并称社区组织大量活动是社区活力的来源。“周一到周四老年人活动，每次约有150人参加；我们每周还有3个年青人群



体的活动。”研究者进行采访时，社区中心的活动室老年人正在进行联欢活动。

中澳两国社区在政治发展层面存在差异。在发展社区居民的民间团体和组织，培养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互助能力方面，望京街道倾向由社区牵头、居民参与，强调互助但不强调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悉尼的韩国人社区与政府关系不紧密，因此在民间团体和组织方面灵活度更高，但组织结构较为松散。

两个韩国移民社区都没有直接提高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望京的韩国人产业链基本围绕满足韩国移民生活需要，当地居民还抱怨他们“消耗地区资源、使物价居高不下”。悉尼韩国人中心则不敢触碰韩国人既有的经营领域。

(三) 传播与媒体对社区发展起到纽带和途径作用

1. 横向社会环境和纵向组织形式决定社区叙事体系

中澳两国的韩国移民社区都体现出在社区维系和发展中对媒体的运用、对传播的重视。传媒是社区传播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个人和社区形成强大的、完善的叙事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样的叙事体系是连接社区成员、产生凝聚力、形成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支撑。比较而言，悉尼韩国移民所在的横向社会环境，即所在国提供的医疗、文化、体育、旅游等社会支持，相对充足、成熟。物理环境上看，社区内的健身配套设施不完善，居民就可能不经常到小区的公共场所活动，那么居民之间碰面和接触的机会就会相应减少，就会不利于形成或发展属于该社区的叙事体系，或者需要更多的社区媒体作用来填补形成或发展叙事体系的空间。其他如社区内没有配套的教育机构（如幼儿园、学校、图书馆、幼儿兴趣班等）或者文化设施相对简陋，居民们只好到社区之外的地方去寻求理想目标。这样一来，他们就很难培养与当地社区的其他组织或社区成员的关系，也很难培养社区的归属感、形成社区凝聚力。

从纵向组织形式看，澳大利亚组织管理地区、社区传播结构的理念和形式也更对“外来人”开放、包容，从而给予韩国移民比较宽阔和弹性化的活动空间。在横向社会环境和纵向组织形式都比较利好的环境下，悉尼韩国人社区的叙事体系构建更为便利、顺畅。

调研中我们发现，两个社区都设有信息布告栏，建设了多媒体传播渠道。在悉尼韩国人中心入

口处，有一个专门的开放空间，汇总有关本机构各方面信息、本社区其他机构分发信息、本城市分发信息的手册和单张，供来客随便查阅。望京社区则在楼门口开辟布告栏，张贴公告等信息。两个社区还分别建有自己的网站、社区媒体。从硬件看，基于媒体的社区叙事体系比较完善；然而望京社区政府主导的纵向组织形式，决定了社区的叙事体系在覆盖社区成员方面存在盲区。望京社区格外重视媒介的宣传、引导、创造意识形态的价值，认为媒介“改变、制造着我们的精神性空气和水，从而最终铸造、改变我们的体质和思想”，<sup>[42]</sup>(P163)最终形成“社区凝聚力”。但是，在访谈中一位主任承认其社区工作人员中“没有懂韩语的”，这与悉尼韩国人中心韩人服务韩人存在明显差异，也决定了社区叙事体系畅通程度的不同。特定的社区传播环境是社区中的居民在不分社会阶层、种族、性别和国籍的条件下，可以参与社区事务的保障。它是形成社区叙事体系、产生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

2. 社区成员在社区叙事体系下共享故事

调查表明，对于同一社区的成员来讲，找到共同话题、彼此共享故事不是难事；但是分享的渠道是否畅通、分享的动机是否充足、分享的频率是否常态则要依赖该社区的叙事体系的成熟度和使用度。望京韩国移民对所在的望京社区在信息的了解上存在着“灰色地带”，<sup>[52]</sup>即基于主观选择不想了解发生在身边但与自己不是直接相关或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尽管自2003年起就不断举办“望京国际文化艺术周”“中外邻居节暨我在北京过大年”“望京大舞台，敢秀你就来”等文化活动，某主任承认“从政府街道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吸引外国人，他们多举办一些私人的私密的小型活动”。

我们发现，社区媒体的使用程度对破除信息灰色地带、分享故事、产生社区归属感有着最直接的作用。两个社区都显示人际传播的功效最大、最明显，告示板、电话是传递信息的最主要渠道。社区自办媒体对形成社区凝聚力的作用也较明显，但第三方媒体，如为悉尼韩国人社区提供免费版面的韩语报纸杂志，为北京望京街道办事处提供版面的《法制日报》，对社区凝聚力的作用不及社区自有媒体。社区网站<sup>®</sup>整体来看访问率不高，互动性不强，仅能作为其他社区传媒的补充。某主任介绍在信息传播方面，他们主要是通过组织公开还有社区的骨干分子去通知，方式包括电邮、传单、口头、微博、微信、QQ群、官网或者论坛等。Kim介绍



悉尼韩国人社区活动安排和沟通主要通过电话和邮箱，同时有几家韩语报纸、杂志免费刊登社区活动和新闻。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人际传播，即口口相传；宗教活动场所如教会和寺庙，在每周的聚会中成为传播社区消息的最有效渠道。

社区成员间的亲密程度决定了分享故事的内容和渠道。Kim 和很多社区成员都是好朋友，因此社交媒体成为 Kim 的传播新方式。他向我们展示他最常用的一款韩语移动社交应用 Kakaoto，相当于中国的微信。“我 5 年前开始使用 Kakaoto，现在有 660 个联系人。”他不但用 Kakaoto 和本地韩国人联系，也用来联系远在韩国的朋友。他说这个“很好，很美丽”，他估计这个应用在悉尼韩国人中覆盖面在 90% 左右。基于望京社区管理者和社区成员之间的非亲密性关系，在 2013 年已经开始普及的微信没有成为望京社区最直接、最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某主任的下属某科长认为工作中“通过 QQ 群去传播消息效率最高”。

### 3. 社区叙事体系下共享故事激发社区活力

比较中澳两国韩国人社区的叙事体系发现，共享故事有助于激发社区活力。在澳大利亚，社区入口处都设有信息交流平台，不但有自己社区的资料，还有很多对社区成员有帮助的信息或者其他社区的资料，自由取阅。在中国，这方面比较不常见，信息获取主要靠咨询，陈列形式多数是展板、告示等，不利于互动和激发社区活力。望京街道办事处人员流动性强，是一个多国移民聚居、多机构商圈的繁华区域；社区的管理者是中国人，与该社区的韩国移民存在天然的共享故事障碍。某种程度上，该社区的叙事体系可以弥补语言沟通的不足，如信息通知使用中韩两种语言，或使用图片通过视觉信息补充文字信息的理解障碍。

社区媒体的创建、利用方式的重要性超过社区媒体的存在性。2013 年调研时，望京地区的网站存在着“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两种模式。“由上至下”利于社区媒体的体制化运作，“由下至上”利于保持社区媒体的活力。北京望京地区有官方的朝阳望京街道网 <http://wjjd.bjchy.gov.cn/web/558/index.html>，望京街道社区服务信息网 <http://wj.bjcs.org.cn/wps/portal/chyl/bjssq>，以及非官方的网站望京网 <http://www.wangjing.cn/>，望京人网 <http://www.wangjingren.cn/>，和新望京网 <http://www.wangjingwang.net/>，排除历史等原因，社区居民自办的网站活跃程度更高，因为其共享故事话题

多、素材多，内容吸引人，方式更自由。

悉尼韩国人中心因频繁的活动、固定的聚会场所、无障碍的语言沟通等原因，共享故事话题丰富，交流便利，因此激发了社区活力，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Kim 介绍说刚刚举行的会长换届充分体现了该社区的活力，洛杉矶韩国人社区成员多，但是参加选举的仅有 2000 人；而悉尼的成员比洛杉矶少却有 6000 人参加，充分证明悉尼韩国人中心成员对社区认同，乐于参与社区发展。

## 六、结语：社区跨文化传播研究亟待重视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其人员关系、信息消费模式和社区构成形式、内在逻辑充分体现着社区的文化，进而构造着社会的文化。尽管社区和社会分别从感性、历史、理性等不同视角进行内部构建和集体约束，但是不妨碍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深度关系。在新兴媒介打造的新兴渠道、内容和信息消费模式的推动下，社区新兴主体也在逐步形成，社区文化叙事重构，尤其是这样的信息流动跨越了物理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理边界在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时候，出于对传播效果的关注视角，亟需将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宏大叙事框架下沉，而传媒与社区的维度介入这样的话语重构正当其时。

调查表明，传媒在中澳两国韩国人社区发展中，对形成社区叙事体系、产成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有直接、重要的作用。两国案例都突出了对人际传播的看重和依赖，对传统媒体形式，如告示牌、印刷品、报纸、电话、短信等比较青睐；新媒体则比较看重邮件和即时通讯工具，网站则因维护、内容建设等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也未能成为有效平台。在 2013 年开展调查时，社交媒体处于新兴状态，在悉尼和北京两地均未有普遍使用，但悉尼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区特点明显为社区媒体日后成为社区成员间的联系渠道做好了准备。

调查发现，在社区发展和建设中，两国社区通常会遵从以下五个指导原则：一是区域特色原则：从社区实际出发，根据社区的特点和发展需要，发展具有特色的社区建设。二是群众参与原则：在特定机构或组织指导和帮助下，发动和组织社区内的成员和机构参与社区建设工作。三是自我发展原则：充分利用本社区的资源，广泛动员社区的力量推进社区建设和发展。从对社区组建者、组织者的采访来看，这些承担社区发展主要推动作用的群体都有着自我发展的意愿和计划。中国的社区管理者自我发展的动力主要是“热爱这个工作”、

“工作岗位本身的要求”、“工作业绩和自我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的社区管理者也都表示“热爱这个工作”、“带来满足感”等。但采访中，两国社区的自我发展主要受到经费和社区资源两个方面的限制。四是利益共享原则：协调社区内各个机构和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共享。利益共享是增强社区成员参与度、认同感、归属感的主要因素。中国社区工作者认为可以识别出的可以共享的利益包括社区居住安全，环境治理等。五是协调发展原则：社区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社区建设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调查发现，中澳两国的社区经营、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社区是政府资助、管理的，因此社区的管理人员不仅在经济上要依靠政府，从行政上面讲，社区工作人员也是有编制的固定职员，除了升迁或调转，社区工作就是他们一直从事的职业。在工作中，“从上至下”的逻辑一直贯穿始终。在协调发展的原则上，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的要求，所以尽管不会过于主动去制定庞大的计划，但他们非常主动、积极地配合任何政府发出的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政策和号召。另一方面，囿于体制框架下允许他们调动的资源和可以采取的行动都是受到限制的，同时这种无需业绩证明既可以维持与理念信仰相关不大的工作性质，也使得他们在协调原则中秉

承无差错、不激进宗旨。澳大利亚的社区工作人员部分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工，也有一些是职业工作。根据被访者自述，韩国人社区认为促进所在国家的整体协调发展和促进社区发展、提升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都很重要。

因为时间、经费、经验等限制，本此调查与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更多纳入跨文化视角，从现象观察、描述、分析深入到理论建构，关注更多问题如“发展”概念在不同个体、社区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维度；“协调”（和谐）东西方的认知差异和社区目标；“群众”（受众）在不同组织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解读和角色定位；“满足”在文化维度界定上的异同等等。如果我们带着跨文化的视角，再纳入社区传媒的传播视角，藉由都市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深入到社区，探究社区文化生态结构在吞吐内外文化信息时的逻辑和理论，社区在纳入不同媒介形式传递多元信息的时候如何化解、突破不同个体的文化边界，为组织性的、国际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来自“基层”的视角和支撑，这样的“社区跨文化传播”（CIC, Communit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范式或者理论框架或许可以逐步建立起来，充实进入国际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提供中国的解读和视角。

〔注 释〕

- ① 原文“A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is the invisible communication or “storytelling” system that makes community possible, set in its residenti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he “storytellers” in the system include residents, local media,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e residenti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cludes public spaces (where people can gather to share stories), the degree of safety in an area,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Like a political or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is usually taken for granted. We hardly even see it until something goes wrong.”
- ② <http://www.tianya.cn/>, 2017年6月5日获取。
- ③ 原文“Society not only continues to exist by transmission, by communication, but it may be fairly to exist in transmission, in communication.”
- ④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mf/2024.0>, 2017年8月11日获取。
- ⑤ 对悉尼韩国人社区经理 Sherman Kim 的访谈，悉尼，2013年12月23日。
- ⑥ 对望京街道办事处的某主任（应受访者要求隐去姓名）的访谈，北京，2013年9月5日。根据望京社区网站2017年2月信息，该社区现状为总人口约26万，流动人口约5万人，其中外籍人约3万人，分别来自8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韩国人占84%。<http://wjid.bjchy.gov.cn/sub/news/63935/3241.htm>。2017年7月15日获取。
- ⑦ 望京西园四区、大西洋新城、望京西园三区。
- ⑧ 对韩国移民 Hannah Park 的访问，悉尼，2013年12月20日。
- ⑨ 本调查案例中韩国人最大、最高动机是经济动机，包括经济收入和事业发展机会；学习动机次之。
- ⑩ 望京地区居住的中国人有20多个民族，移民来自80多个国家。
- ⑪ <http://wjid.bjchy.gov.cn/sub/news/63943/3244.htm>。2017年7月15日获取。
- ⑫ 悉尼韩国人中心网址：<http://koreanet.org.au/>，望京街道办事处网址：<http://wjid.bjchy.gov.cn/web/558/index.html>。



[参考文献]

- [1] Hillery, G. A.,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 *Rural Sociology*, 20 (2), 111 — 123. 1955.
- [2] [德]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M]. 林远荣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3] Maciver, R. M.,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New York: Macmillan, 1928.
- [4] [美] 帕克. 城市社会学 [M]. 宋俊岭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5] [美]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 农民社会与文化: 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 [M]. 王莹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6] Parsons, T.,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71.
- [7] Park, R. E.,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Journal of Social Forces*, (6), 1922.
- [8] Park, R., Burgess, E. W., Mckenzie, R. D.,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9] Harvey D.,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 (1), 1989.
-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 [11] [印度尼西亚] 纳匹图普鲁. 高等学校对于社区发展的实际贡献 [J]. 泽宏译. 外国教育资料, 1979, (2).
- [12] [苏丹] 拉希德. 苏丹的高等学校和社区发展 (摘译) [J]. 傅统先译. 外国教育资料, 1979, (2).
- [13] 张钟汝. “社区”概念的由来、本质特点及其应用——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社区”讨论会综述 [J]. 社会, 1984, (4).
- [14] 顾晓鸣. 为什么要使用“社区”概念 [J]. 社会, 1984, (4).
- [15] 祝瑞开. 对使用“社区”一词的浅见 [J]. 社会, 1984, (4).
- [16] 夏杰. 苏联社会学文献中的“社区”与“共同体” [J]. 社会, 1984, (4).
- [17] 何肇发. 社区概论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 [18] Gould, T., *The future of Facebook: Building global community*. March 2nd, 2017. <http://oxfordstudent.com/2017/03/02/future-facebook-building-global-community/>.
- [19] 肖萍. 社会学概论 [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
- [20] Farrington, F., *Community Development: Making the Small Town a Better Place to Live in and a Better Place in Which to Do Business (Classic Reprint)*, Forgotten Books, 2017.
- [21] Sanderson D., Polson R. A., *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New York: J. Wiley, 1939.
- [22] 刘贤臣. 我国社区媒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 [D]. 暨南大学, 2010.
- [23] Ball-Rokeach, S. J., *Community Storytelling, Storytelling Community: Paths to Belonging in Diverse Los Angeles Residential Area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2001.
- [24] 张咏华. 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 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 (2).
- [25] Ball-Rokeach, S. J., *The Metamorphosis Project Research Team, The challenge of belonging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ase of Los Angeles, Metamorphosis Project White Pap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ty Progra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2000.
- [26] Jiang, F., Huang, K., *Community Media in China: Communic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Relo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 (1), 2013.
- [27] 刘仁江.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传播研究 [D]. 厦门大学, 2008.
- [28] Gold S., *Differential adjustment among new immigrant family memb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7, 1989.
- [29] [日] 广田康生. 移民与城市 [M]. 马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30] Peters, J. D., Simonson, P., *From Hope to Disillusionment: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Coalesce 1919 — 1933*, in Peters, J. D., Simonson, P.,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Key Texts, 1919—1968*,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 [31] 赵燕萍. 论传统媒体 (报纸) 的社区功能 [J]. 兰州学刊, 2003, (5).
- [32] 于文杰. 浅谈社区对媒体的重要性 [J]. 兰州学

- 刊, 2003, (5).
- [33] 郑保章, 楼旭东. 营造媒体社区 提高传导水平——《大连晚报》办报发行理念的突破与创新[J]. 中国报业, 2003, (2).
- [34] 路百鸣, 曹永忠, 李慧. 电视媒体社区: 地方电视台发展的新空间[J]. 山东视听, 2003, (1).
- [35] 付阳阳. 中国社区媒体的发展路径探析[D]. 西南政法大学, 2010.
- [36] 周敏. 北京城市社区媒体的发展现状及居民期待调查[J].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 (1).
- [37] 王青山. 社区建设与发展读本[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 [38] 李慧. 我国社区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探析[J]. 消费导刊, 2008, (8).
- [39] Maine, H. S., 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to Which Are Added Other Lectures, Addresses and Essays 1876,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09.
- [40] 罗霆. 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传播与社区媒体: 以社区报为例[J].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 2011, (6).
- [41] [美] 梅勒文·德弗勒, 埃弗雷特·丹尼斯. 大众传播通论[M]. 颜建军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42] 姜飞.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43] 姜飞. 美国文化寓言[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11-17.
- [44] 薛原. 悉尼奥运会与澳洲土著[N]. 人民日报, 2000-09-15.
- [45]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Glossary on Migration. Geneva: IOM, 2004: 33.
- [46] 阎海东. 专访在华韩国人协会会长林英虎“文化差异, 没有错对之分”[J]. 世界博览, 2012, (14).
- [47] 何波. 北京市韩国人聚居区的特征及整合——以望京“韩国村”为例[J]. 城市问题, 2008, (10).
- [48] 张丽娜, 朴盛镇, 郑信哲. 多民族、多国籍的城市社区研究——以北京市望京地区为主线[J].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2009, (2).
- [49] Bonacich, E.,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5), 1973.
- [50] 马晓燕. 城市建设中移民聚居区的出现及其特征体现——基于北京市望京“韩国城”的调研[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6).
- [51] 郑信哲, 张丽娜. 略论北京望京地区韩国人与当地汉族居民的关系[J]. 当代韩国, 2008, (3).
- [52] 姜飞, 黄廓. “传播灰色地带”与传播研究人文思考路径的探寻[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4).

## Media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from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orea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Australia o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HUANG Kuo<sup>1</sup>, JIANG Fei<sup>2</sup>

(1. English Service,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Beijing, 100040, PRC;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PRC)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community, immigration and media, which are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rrent social reality of China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aking the Korean communities in both China and Australia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ole and value of media i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Researchers are aware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society brought about b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and new media,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personnel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of immigrants. This study also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conducting the “Communit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IC) research in China and worldwide.

**[Key words]** community media;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n studies; communit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胡晓春/校对 谷雨)